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匹兹堡学派研究

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

孙 宁 著



非外借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匹兹堡学派研究

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

孙 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兹堡学派研究: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孙宁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8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刘放桐,陈亚军主编)

ISBN 978-7-309-13777-4

I. ①匹... II. ①孙... III. ①塞拉斯-思想评论②麦克道威尔-思想评论
③布兰顿-思想评论 IV. ①B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5531 号

匹兹堡学派研究: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

孙宁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04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777-4/B·665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出版基金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
资助出版

总序

刘放桐 陈亚军

在西方传入中国的诸多哲学思潮中,若论影响之巨大,经历之坎坷,除马克思主义外,大概没有哪一个可以和实用主义相比。从一百年前的热捧,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鞭笞,再到近二三十年来的正视,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待实用主义的姿态,经历了令人晕眩的大转变,其中折射出国人对待实用主义的复杂心态。不久前《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问世,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消息:经过老一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学界对于实用主义的译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用主义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此时刻,人们自然会问,如此关注实用主义,意义何在?我们的回答是:

首先,实用主义乃美国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从开国元勋到民主、共和两党领袖,从心系国家大事的硕学鸿儒到只关心衣食住行的贩夫走卒,美国人所奉行的基本哲学,归根结底,是实用主义。可以说,要弄清当今美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法律、外交等等,离开对实用主义的深入理解,只能停留在皮毛。欲了解美国,不能不了解实用主义。

其次,实用主义乃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先驱。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向,说到底,就是理性主义传统向实践主义传统的转向,知识论传统向生存论传统的转向。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被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对超验世界的眷恋被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所取代。在这一转向中,实用主义和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相互呼应、殊途同归。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从研究实用主义入手,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再次,实用主义乃中国传统哲学的知音。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中国

哲学从来没有产生出建立在二元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中国哲学传统所关注的天人合一、生活世界及伦理实践出发点,与实用主义有着极其相近的旨趣和追求。研究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异同,既有助于增强中国哲学的自信,也有助于改进中国哲学的缺憾。

最后,实用主义乃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对话者。同为现代哲学转型的典范,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相似的主张。它们从同一个方向批判西方哲学传统,又从同一个方向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虽然途径有差别,话语有不同,观点也不无分歧,但它们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研究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有助于看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生命力,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思想资源。

与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哲学形态不同,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学院派哲学。这不仅表现在实用主义者们拒斥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割裂,而且也表现在实用主义深深影响了美国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事实。杜威在这一方面堪称表率。他的哲学早已越过学院围墙,渗透到美国文化土壤的方方面面。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紧密相连,唇齿相依。一方面,固然可以说,理解美国思想文化不能不理解实用主义;而另一方面,也必须说,理解实用主义不能不理解美国思想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实用主义不可与研究美国思想文化脱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系列的视野,比起一般的实用主义研究,要更加开阔:实用主义是这一视野的焦点,而美国思想文化则构成了这一焦点的“穗边”。

或许应该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用主义虽然起源于美国,但绝不限于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尼采就已经被称作“德国第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法国的柏格森与实用主义者的思想上的相近,也在他与詹姆斯的相互欣赏中表露无遗。再后来,无论是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还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阿佩尔、伽达默尔,或是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无不透露出浓重的实用主义气息。称不称他们为实用主义者,其实无关紧要。实用主义早已存在“在那里”,对于它的“在那里”的研究,同样是本系列所

欲涵盖的。

本研究系列旨在全面展示我国学术界实用主义乃至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对话与交流、切磋与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就不会有本系列研究成果的及时问世。

最后,我们也期待着学术界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让我们共同努力,将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序 言

陈亚军

孙宁博士的大作《匹兹堡学派研究》问世了。对此,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惭愧。高兴的是,我国学术界终于出现了一部关于匹兹堡学派的专门论著。它的问世表明,年轻一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与国际学术同行已基本保持同步,这在二三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惭愧的是,我也早有作此研究的打算,但却力有不逮,迟迟未能下笔。孙宁博士的成就,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懈怠与不足。

我一直认为,匹兹堡学派是最值得关注的当代美国哲学流派,匹兹堡的三位哲人也是当代美国最杰出、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当罗蒂执意将自己和普特南的名字从“美国哲学四大家”中勾掉而补上塞拉斯和布兰顿时,我想他并不仅仅是出于谦虚。因为,匹兹堡学派的确不仅为美国哲学的未来开出了一条新路,而且也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曾在一篇谈匹兹堡学派的短文中说过:“在它身上,语义学与语用学、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弗雷格方式与黑格尔路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等等,融为一体。这意味着,所谓英美哲学传统与大陆哲学传统的长期对立,有可能得以克服和超越。”

研究匹兹堡学派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这是一块公认难啃的硬骨头。匹兹堡学派的三位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有行文晦涩曲折、立意新奇突兀、论证细致入微的特点。塞拉斯的新颖同时也意味着孤独,他始终为当年的洛克讲座最后落得只有三位听众的尴尬场面而耿耿于怀,但塞拉斯应该想到,弄懂他的思想不仅需要分析哲学的训练,更需要德国哲学的素养,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种过高的要求。塞拉斯的继承者延续了他的风格。麦克道威尔的描述逼着读者们在他设置的对话

中探幽入微,这需要极大的辨析能力和极强的领悟力;布兰顿的体系则考验着读者的持久专注力,其环环相扣的学理延展,要求读者具有高度的思维耐力和广泛的背景知识。由于这些困难,研究匹兹堡学派便是一种挑战,虽然关于以上三人的单个话题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有关这个学派的整体研究成果,迄今仍付之阙如。在此意义上说,孙宁的论著来得正是时候。

孙宁与我相识已久。2003年我去南京大学工作,他正在那里就读。后来他出国留学,随当代著名实用主义学者、美国原杜威中心主任希克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再后来是学成归来,入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他在西方哲学史和当代英美哲学两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学养积累,这也为他的匹兹堡学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专业保证。我注意到,在他的这部大作中有三道耀眼的底色,即开阔的哲学史视野、细致的概念分析以及鲜明的实用主义背景。这,也正是我十分欣赏并感兴趣的地方。平铺直叙地就匹兹堡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的各个观点加以解说和评论,虽然殊为不易,但毕竟有点平庸。一部研究专著,总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眼光。从一个视角切入,将整个内容提拎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结构,这样才能给读者带来新颖的感受、深刻的启发。

孙宁这部论著的焦点人物是塞拉斯。由塞拉斯牵出麦克道威尔及布兰顿,是自然的也是准确的。不论是对匹兹堡学派略有了解的读者,还是麦克道威尔及布兰顿本人,对此都是无异议的。但塞拉斯的思想脉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一点学术界很少关注,而缺乏这个维度的研究,对把握塞拉斯思想无疑是个缺憾。孙宁对塞拉斯的两个基本论题,即所予神话和科学实在论,从哲学史的角度加以梳理,分别将刘易斯和老塞拉斯的思想纳入考察范围,为理解塞拉斯的这两个重要论题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此外,他也对匹兹堡学派与康德、黑格尔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为匹兹堡学派何以被看作分析哲学的新德国观念论给出了解答。这是我赞赏孙宁这部论著的第一点。

我对孙宁这部论著的第二点欣赏之处是他在阐释匹兹堡学派的观点

时能入乎其内。匹兹堡学派的观点极为精细,要想将这些精细的思想讲清楚,并对其做出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但孙宁在这点上做得很出色。他的论述细腻从容,同时又有论据支撑。看得出来,他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对塞拉斯所予神话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对康德与塞拉斯的同异的梳理,尤其是对麦克道威尔思想内涵的阐发,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他将匹兹堡学派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叙事框架中,匹兹堡学派是实用主义传统的当代继嗣。或许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并不接受实用主义这个头衔,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贴近实用主义的。不论是在拒斥所予神话、否定基础主义传统那里,还是在黑格尔的继承与发扬那里,都听得到实用主义的回声。孙宁深受实用主义的熏陶,对此当然十分敏感。他不仅对布兰顿这个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的实用主义思想做了清晰的阐发,而且也对整个匹兹堡学派与实用主义的亲近有很好的分析。他的研究使我对匹兹堡学派如何将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相结合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

孙宁博士的这部《匹兹堡学派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相关研究领域的杰出之作。对每一个对当代美国哲学乃至当代西方哲学感兴趣和想有所了解的人,这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孙宁的这部专著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我相信并期待,随之而来的会更多。

是为序。

目 录

001 / 第一章	匹兹堡学派的总体思路
017 / 第二章	如何真正摆脱所予：C. I. 刘易斯与塞拉斯
032 / 第三章	科学实在论语境中的老塞拉斯与塞拉斯
054 / 第四章	康德、塞拉斯与麦克道威尔
086 / 第五章	从第二自然到世界观：麦克道威尔的转向
105 / 第六章	心灵哲学和知觉理论：麦克道威尔与普特南
145 / 第七章	从康德—塞拉斯论题到分析实用主义：布兰顿的实用主义路线
166 / 第八章	“意义”的意义：塞拉斯与布兰顿
188 / 第九章	黑格尔、古典实用主义与匹兹堡学派
221 /	附识与后记
230 /	参考文献

匹兹堡学派的总体思路

大致从 1950—1970 年,英美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重要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直接性”(immediacy)和“所予”(givenness)的批判,这一思路在英国以奥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的《感觉和可感物》(1962)为突出代表^①,在美国则以塞拉斯(Wilfrid Sellars, 1912—1989)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56)为主导。此外,我们还可将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等人提出的“理论蕴涵”(Theory-Laden)视为这一思路在科学哲学上的一个总结。斯特劳森(P. F. Strawson, 1919—2006)在对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哲学研究》(1953)的评论中精确刻画了这一转向的两个特征:“对私人性的敌意”(hostility to privacy)和“对直接性的敌意”(hostility to immediacy)。② 概而言之,这一思路试图从根本上克服自近代早期以来的认识论基础主义,后者认为知识必须包含“给予心灵的”(given to the mind)和“由心灵增加的”(added by the mind)两部分,且第二部分必须以第一部分为基础。对基础主义的克服主要针对第一部分的内容展开,即质疑不受心灵影响的材料性所予的合法性。这条思路看似明了,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难点:虽然从所予出发的理论无法说明认识的客观性(它们最多只能设定所予与对象之

① 奥斯汀的主要批判对象是艾耶尔的感觉材料理论, see A. J. Ayer,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London: Macmillan, 1940)。艾耶尔对奥斯汀的回应文章“Has Austin Refuted the Sense-data Theory?”收于 A. J. Ayer, *Metaphysics and Common Sense* (London: Macmillan, 1969)。

② P. F. Strawson, “Review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ind*, 63 (1954), pp. 90ff.

间存在某种神秘的一致关系),但抛弃所予之后的理论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除非它们愿意停留在现象论层面。自塞拉斯批判所予神话以来,一批哲学家的工作——比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 1942—)、布兰顿(Robert Brandom, 1950—)等——都是围绕着这一难题展开的。本书要研究的匹兹堡学派(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不但处于这个宏观语境中,更是它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古典知识理论将知识把握为直观(aisthesis)与推论(dianoia)合作的产物,认为直观为概念提供材料,概念在直观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操作。这条基础主义的思路存在着难以弥补的根本缺陷: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直观的非推论性运作,然后再说明推论对直观内容的进一步建构。哲学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对这两个步骤的说明最终都只能引向神秘:前者引向神秘的所予,后者则引向概念对直观的神秘建构。这种困境是我们在直观与推论之间作出区分的必然后果。匹兹堡学派建议我们抛弃直观与推论之间的这种本质性区分,并试图论证一种“直观—推论”的连续体。根据这一思路,直观不再是建构的起点,而是建构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主体将概念运用于直观,而是直观中已经包含了概念的自发运作。心理过程的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概念运作,这本来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观念。但是,由于自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抽象主义(abstractionism)思路对我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概念是被施加于心理过程上的,是对非概念的原始心理过程的进一步抽象。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追随者吉奇(Peter Geach, 1916—2013)曾在《心理行为》(1957)中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概念“从直接经验中将某些特征挑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就是所谓的将它们抽象出来;与此同时也就忽视了其他特征,也就是所谓的从其他特征中抽离出来”^①。吉奇认为这条抽象主义的思路只对概念运作进

① Peter Geach, *Mental Acts: Their Content and Their Objec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p. 18.

行了二级层面上的分析,而非发生学层面上的分析。换言之,抽象主义的思路会不可避免地掩盖概念在知觉层面上的原初运作。维特根斯坦将这种掩盖称为“欺骗性把戏的决定性动作”(the decisive movement in the conjuring trick)。^① 我们看到,无论是概念主义者还是反概念主义者,他们对概念运作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抽象主义的思路中。比如,概念主义的反对者福多(Jerry Fodor, 1935—2017)在《心灵的模块性》(1984)中指出,知觉系统是“信息封闭的”(informationally encapsulated),“核心心灵”(central mind)的概念运作影响不了知觉状态下的内容。^② 匹兹堡学派则试图阐明,对概念运作的分析必须从二级层面推进至发生学层面,原初的“看”(seeing)必须同时是“看作”(seeing-as)。基于这条思路,他们试图在抽象主义思路之外探讨一种非判断性的概念内容,也就是所谓的推论性直观。

匹兹堡学派将这条线索追溯至康德,在后者的直观(Anschauung)中找到了推论性直观的可能性。他们对康德的一个关键解读是:康德对概念运作的探讨并不是沿着抽象主义的思路进行的,康德那里的直观从一开始就是命题性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从一开始就是理由空间内的规范性运作。他们认为,康德的核心洞见是坚持命题性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propositional),而这一洞见自笛卡尔以来就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匹兹堡学派认为,除了用坚持命题性的首要性来摆脱基础主义,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点:命题并不是独立的,我们必须以一种整体性视角来考察命题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界定各个命题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鲁滨逊式的知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塞拉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并非针对所予,而是针对所予背后的语义原子主义(semantic atomism)。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和奎因(W. V. O. Quine, 1908—2000)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3)构成了一个共通的方案。奎因告诉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2009), § 308.

② See Jerry Fodor, *The Modularity of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pp. 64–86.

我们,最小的意义单位不是句子,而是理论。类似地,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指出:“我们只有得到其中包括绿的概念的一整套概念才能得到关于绿的概念。”^①基于这一方案,匹兹堡学派对康德的这种解读必然要求他们同时对康德进行整体主义式的改造,不过他们在德国观念论内部找到了改造的资源。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认为,我们要将一种黑格尔式的步骤引入康德的先验框架,将概念的形式化应用改造为“心灵/世界”在一个整体性历程中的自我展开;而布兰顿则认为,重要的不是先验层面上的改造,而是用黑格尔式的视角互动观和社会实践观补充康德对于概念形成和运作的理解。但无论如何,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推进是这条思路的必然方向。

通过对康德的改造,匹兹堡学派对抽象主义的拒斥获得了可操作的场地:概念的运作就是理由空间内的规范性运作,这种运作并不是主体的抽象活动,而是主体间的互动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匹兹堡学派提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思维的基本形式是体现理性关系的言语表达。匹兹堡学派的哲学是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他们在语言转向这个整体语境内部刻画了一条独特的思路。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指出:“根本在于,在将一个片段或一个状态描述为认识到的片段或状态时,我们不是在经验地描述那个片段或状态;我们是在将它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即证成和能证成我们所说的话的逻辑空间。”^②匹兹堡学派认为,思维就是内言语(inner speech),或者用塞拉斯的话来说,思维就是“用语词思考”(thinking in words)或“大声想出来”(thinking out loud)。既然思维被理解为断言的行为(acts of asserting)或断言行为所断言的内容(contents of assertion),那么它就必须给出和要求理由的规范性运作中得到理解。他们进而认为意向行为也是以公开的言语行为(overt verbal performances)为基本模式

①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4. 中译引自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② Ibid., p. 76. 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第61页。

的,换言之,内在片段或状态是言语行为的派生,“thinking that-p”从本质上来说就是“proposition that-p”。塞拉斯在《心理事件》(1981)中明确指出了他与传统观念的根本分歧:“我认为,与思维意向性相关的概念是从与有意义言语相关的概念那里派生出来的。”^①因此,匹兹堡学派的鲜明立场是,断言不只和其他言语行为相关联,还与知觉(比如看到一个苹果)及非言语行为(比如吃苹果)本质相关。很明显,在匹兹堡学派看来,一个非语言或前语言的生物并不能把握语言生物所能把握的逻辑关系,塞拉斯明确指出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他的心理学唯名论(psychological nominalism):“否认有任何对逻辑空间的意识先在于(或独立于)语言的习得。”^②塞拉斯由此区分了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跟随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区分了第一自然(first nature)或动物性自然与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布兰顿则一再强调感觉(sentience)与智识(sapience)的区分。匹兹堡学派认为从动物性功能到人类的言语行为并不存在连续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显然处于进化论的语境之外。^③我们知道,和匹兹堡学派相反,基于进化论的连续性思路恰恰是古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理论资源,比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1925)中明确指出:“认识性经验必须起源于非认知性经验,否则就违背了历史和自然的连续性。”^④因为这个关键的分歧,我们在探讨和界定匹兹堡学派中的实用主义线索时必须非常小心和谨慎。

匹兹堡学派认为,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与规范紧密相连,语言的使用者在理由空间中根据对规范的理解作出言语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下面这个康德式的区分对匹兹堡学派而言就显得尤为关键:单纯依照

① Wilfrid Sellars, *In the Space of Reasons: Selected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83.

②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 66. 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第53页。译文有改动。

③ See also Noam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Eric H.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1967).

④ LW 1:29-30.

法则而行动与根据对法则的理解而行动。塞拉斯在《哲学与人的科学图像》(1960)中指出:“能够思维就是能够根据正确性、相关性和可证性的标准测量自己的思维。”^①对语言使用者来说,最重要的技能是明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法则与规范,并由此获得成熟的信念。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哲学的核心工作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匹兹堡学派分享了对自然语言的清醒认识: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深陷在自然语言中,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然语言的成就。麦克道威尔在《心灵与世界》(1994)中将自然语言视为我们每个人的传统,他指出:“我们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的自然语言是传统的仓库,储存了在历史中累积起来的,关于何事为何事之理由的智慧。继承传统的每一代人也在反思中修改着传统。”^②在匹兹堡学派看来,学习和使用自然语言是进入理由空间的必要条件,而学习和使用自然语言就是在尝试把握不同断言之间的理性关系。在麦克道威尔的这条思路,布兰顿另外强调了一点:帮助我们进入理由空间的自然语言并不必然要求形成清晰的法则和规范,我们在断言和表达信念时并不一定会用到清晰的逻辑语汇(其中最典型的形式是“If p, then q”式的条件句),换言之,存在非逻辑语汇的实质推论,逻辑语汇的功能是使实质推论清晰化,在这个意义上布兰顿将“使之清晰”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Making it Explicit*),这个目标并不能通过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实现。为了获得成熟的信念,布兰顿建议在关于共同世界的不同视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当然,塞拉斯在区分科学图像(*scientific image*)和显像图像(*manifest image*)时已经认识到了视角的相对性,他还提出建立一种调和这两种图像的“全览”(synoptic)图景,布兰顿试图在推进这一点时避免作出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哲学的根本任务不是确立某个视角的优先性,而是对我们选择某个视角的理由作出清晰准确的说明。

① Wilfrid Sellars,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Atascadero: Ridgeview, 1963), p. 11.

②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6.